

“坏女人”徐大雯 曾担心成为谢晋的小老婆

《大师谢晋》是导演谢晋生前唯一认可的个人传记。作为

谢晋生前好友，本书作者揭开了常人所不知的大师谢晋与夫

人徐大雯的情感历程。

和谢晋吃顿饭，美丽少女徐大雯成了“坏女人”

谢晋早年曾就读于江安国立剧专。江安的生活是枯燥而萧索的，不过，对于大多数从大城市来的师生来说，春天的江安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使正处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暂时忘却了求读生涯的艰辛和时局动荡所带来的不安。的确与那些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挣扎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人间的天堂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端庄的姑娘走进了谢晋的视野。她叫徐大雯，是地地道道的江安城里人，12岁那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这使得这个昔日的富家千金常常处于一种郁郁寡欢的心态之中。虽然，比起一大帮穷学生来说，她仍是富有的，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感到自己的心里苦闷。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17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一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20岁。

几十年以后，当昔日这位江安城里顶呱呱的“上江”女子在忆及她与谢晋这段一见钟情的美满姻缘时，目光中仍掩饰不住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与润湿。“我与谢晋相识，可以说是天公作的美，因为我们江安女中与国立剧专只是一墙之隔，墙的这边是我们的学校，墙的那边是谢晋的学校。”

“我认识他时他还不到20岁。我更小，他年轻时就长得魁梧高大，喜爱运动，更爱打架，他打架是出了名的，当时国立剧专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不少进步师生，也有国民党的特务，谢晋血气方刚，爱出头，爱打抱不平，看到有人欺侮女同学，不管对方有着什么身份，就冲上去打架，他打架打得可凶呢，谁也劝不住，别人不敢出头的事他敢！”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好感，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因为他有正义感，并且是个直肚肠，说真话的人！”

“江安距离重庆有几百公里，是一个小县城，一向很封闭，我那时爱演进步话剧，又常与谢晋这些爱国学生在一起抛头露面，就已经为当时的反动势力所注意。另外，我们那儿的人排外情绪又十分厉害，一向讨厌抗战后到这里来的‘下江人’，我爱上了‘下江人’谢晋后，惹怒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两股势力糅合在一起，就



年轻时的谢晋 (资料图片)

使我再也无容身之地了！”

“谢晋20岁生日的那天，他邀了好几位女性朋友吃饭，我也去了，我们堂而皇之地在茶楼上吃饭。这还了得，于是一阵风地传开了，次日我就被开除出校。从此，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坏女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说我父亲死得早，没人管，丢了江安人的脸。母亲哭着让我去重庆找舅舅，于是，我不得不只身一人来重庆投奔我的舅舅。我学校的几位好同学偷偷地帮我把留在学校里的几件衣服拿出来，送我上路。谁也不敢与我多说话，因为一个女学生被学校开除，在江安城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所以，在人们的心中，我简直是坏透了……”

舅舅鼓励外甥女徐大雯与谢晋好下去

经过了江安的这场风波，谢晋与徐大雯一下子似乎成熟了不少。谢晋和徐大雯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既然人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明媒正娶，让那些鄙视他们的人看看。

1943年初，重庆中央青年剧社来了一位年轻的场记，他就是谢晋。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城市里有许多剧团，可想而知是够热闹的，但与江安相比，重庆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陪都，重庆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厉害，更直接。

中青社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以抗战题材为主，如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和《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演其他的一些进步剧目，如《少年游》《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谢晋在这些剧目中常担任副角、场记，有时也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

徐大雯那时住在舅舅家，舅舅在重庆的一家公司里任职，家境尚过得去。对于谢晋这位未来的外甥女婿，他曾有过几次接触，也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过饭，总的印象是，除了对他的演技职业表示不敢恭维外，对人品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他是赞同并鼓励外甥女与谢晋好下去的。徐大雯后来回忆说：“经过了江安的那场周折，我们的感情更进了一层，他对我的感情十分专一，我也一定要与他好下去，一方面我真心喜欢他，另一方面我们只有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挽回我的名誉。”

1938年至1943年，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的大轰炸。那些日子，中青社仍在坚持每天排练，但演员们也已早是人心惶惶，特别是有时正在排练，一阵警报响起，大家赶快扔下道具，躲到防空洞里去，每天几次下来，吓得人快要崩溃。面对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谢晋与徐大雯常常处在一种迷茫和彷徨的煎熬中，他们常常问自己，怎么办？

在焦虑、企盼和等待中，1945年终于来临了，8月15日早晨，谢晋还没有起床，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广播中传

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广播还没结束，整个山城便已沸腾了起来。

在弥漫着浓浓鞭炮硝烟的大街上，谢晋拉着徐大雯的手，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他们感到幸福正在成为现实。

徐大雯曾担心会成为谢晋的“小老婆”

1941年春天那个闷热的晚上，当谢晋提着一只旧皮箱，悄然离开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库门至今，已经整整4年过去了。该是回去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的时候了。

谢晋是个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巴不得马上就办成，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徐大雯一说，徐大雯也赞同。

1946年3月的一天，谢晋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轮。徐大雯则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码头上与谢晋道别，她暂时还不能跟谢晋同赴上海，因为她高中尚未毕业，她还须在重庆留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徐大雯来说，除了与恋人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外，她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重庆与上海远隔千里，谢晋此次一去，会不会变心呢？再说他们又尚未结婚，就说谢晋对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年，当“下江人”谢晋与“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传开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吗？现在，当一个外地破落地主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谢家公子的时候，那个家庭，是否会友好地接纳她呢？

后来，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她说：“抗战胜利后，谢晋辗转回到家时，身上长满了虱子。到了上海，谢晋自己筹款组织了剧社，可是不久就破产。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庆文德女中毕业，谢晋特地从上海赶来重庆，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诉我办剧社失败的情况，问我怎么办？而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变心，在上海有没有‘原配夫人’。因为抗战时期，‘下江人’到了重庆后，隐瞒原来的婚姻，让我们‘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确实很多，抗战一胜利，这些问题都开始暴露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对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见谢晋确实真心实意地只爱我一个，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准备，我也总算没有白爱他一场，觉得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位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的婚礼终于在上海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除了亲友，还有谢晋少年时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德高望重的剧作家洪深当了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因母亲陈振美的坚持，婚礼既采用了新派的方式，比如拥抱、接吻，也沿袭了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总之，婚礼办得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摘自《大师谢晋》顾志坤著 2008年版 (来源:文汇报 作者:顾志坤)

沙发上的血渍引出 170多年前普希金决斗黑幕

近日，圣彼得堡普希金博物馆将馆内一个皮沙发送交科学家检验，以期证实上面溅有19世纪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血。1837年，在一场愚蠢的决斗之后两天，被射中腹部的旷世天才亚历山大·普希金在家中去世，年仅38岁。

《圣彼得堡时报》2月10日的报道说，科学家们从沙发上获取了27支棉签样本，其中包括一份可供比对的血渍样本。对馆藏沙发的初步检验显示，其上确有多年前留下的血渍，且血渍属于男性。

如果证实普希金确曾在这张沙发上流血，专家们还希望能进一步揭示出大诗人死前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医疗救治，以及如果当时将他送往医院而非呆在家里，他是否有生还的可能。

从沙发上取得的血样将与普希金受伤时所穿马甲上的血渍进行比对，以期发现两者是否属于同一事主。

该沙发已在馆中普希金书房内展出了70余年，并有明文介绍，称普希金就死在上面。但有员工一直对沙发的来历表示怀疑。沙发获赠于1937年，来自苏联国家历史博物馆。此前，它属于费洛索夫家庭，普希金小儿子格里高里的妻子将它作为礼物赠与了前者。

普希金乃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在其短暂一生中他欠下多起情债，这一方面激发了他的诗歌创作，一方面也令他不断惹祸上身。

1837年，圣彼得堡谣言纷飞，称法国流氓乔治·丹特士觊觎大诗人美貌绝伦、亦风流蚀骨的太太娜塔丽娅。普希金发出战书，单挑法国人，终因枪伤不治而死。丹特士亦被诗人打伤，但很快痊愈。

若普希金决斗未死也活不了

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俄国伟大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主要作品有浪漫主义诗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叙事诗《南方组诗》、长诗《茨冈》、长篇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和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作为12月党人的朋友，普希金写过《自由颂》，诗中曾有“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专制的暴君和魔王/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这样诅咒沙皇的诗句。

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死去后，俄国社会盛传，这是沙皇尼古拉一世蓄意制造的杀害案件，即沙皇故意听任丹特士激怒普希金并迫使普希金与之决斗，从而借丹特士除掉他所仇恨的普希金。最近，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PTB-NA)发现一批档案，进一步揭开了关于普希金死亡的内幕。这卷名为《御览军事司法案件报告：1837年2月到4月》的档案，是1837年俄国总检察院、最高军事法庭呈送沙皇尼古拉一世关于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事件的材料。新发现的档案材料中，正有涉及普希金决斗案件的决议等材料。这些材料能够进一步佐证，在诗人普希金的死亡事件中，沙皇宫廷扮演了极为卑劣的角色。

决斗源于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

普希金在一家甜食店里喝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杯咖啡，然后在朋友丹扎斯的陪同下，走出店门，乘上雪橇来到小黑河畔。这一天，天空布满了阴霾，在凛冽的寒风中，普希金与



资料图片

丹特士选择以中世纪式决斗来了结他们之间的恩怨。在丹扎斯的公证下，丹特士获得了首先开枪的权利，死一般的静穆下，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曾经胜过一次决斗的普希金这次没有那么幸运。结果普希金腹部中弹，两天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从此陨落，年仅38岁。普希金与丹特士之间的恩怨，源于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娜塔丽娅容貌出众，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与娜塔丽娅

结婚。随后，这对恋人共同生活了6年，并先后生了5个孩子。但是法国青年丹特士的出现，破坏了普希金家庭的安宁。丹特士外表健壮，风流潇洒，但被认为是个好色之徒。1835年6月17日，普希金夫妇在偶然间遇到丹特士。随后，在沙皇的支持下，丹特士开始疯狂追求娜塔丽娅，一时间，娜塔丽娅与丹特士之间的流言在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为了自己的妻子，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普希金最终选择了决斗的方式来了结丹特士之间的恩怨，并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场有预谋的挑逗

1836年11月，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同时收到一封用法文书写的匿名信——这封信命名为“绿帽子”证书的信件写道：“荣誉勋章协会、尊贵的绿帽子和骑士勋章协会在会长、S.E.D.L. 大勋章获得者纳雷什金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任命亚历山大·普希金为该协会副会长和功勋文学家”。这种羞辱性的匿名信深深地激怒了普希金。经过调查，该侮辱信是丹特士的义父、荷兰驻俄国大使盖克恩男爵策划的。

1837年1月26日，就在决斗前一天，普希金曾满怀怨恨，写信给盖克恩，对他质问和谩骂：“男爵先生！请允许我简单陈述一下发生的一切。贵公子的品行我早就了解……而阁下您自己的行为也并非得体。身为荷兰王国的代表，作为父亲，您竟然给贵公子拉皮条。他的所有行迹（相当让人感到为难）似乎都得到了您的指示……您就像一个老淫棍一样，无处不在地尾随我妻子，对她（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说您的私生子（或所谓的儿子）爱她。他染上花柳病，呆在家里时，您却说，他就要因为爱我的妻子而死掉了。您对她说：‘请把我的儿子还给我……’我不想再让我妻子听您（作为丹特士父亲）的规劝，也不能容忍贵公子在自己做出丑恶行径之后还敢去找我妻子；此外，我也不希望他再说粗野的俏皮话，装作忠诚和感情不幸的样子——而他实际上是一个混蛋、下流坯。男爵先生，我不得不请求您，结束这一切勾当……我将感到三生有幸。您忠实、驯顺的仆人，亚历山大·普希金。”

随即，盖克恩鼓动义子丹

特士与普希金决斗。

杀人者丹特士被从轻发落

决斗事件之后，总检察院审理该案件，同时，也收集了各级军官的意见。军事审判委员会认定丹特士中尉和丹扎斯中校（当时，按照决斗的惯例，普希金让朋友丹扎斯作为决斗的见证人）有罪，丹特士参与同士官普希金的决斗，并用手枪射击造成普希金受伤，很快他就因伤死去；而丹扎斯在决斗时在场。军事审判委员会依法判丹特士和丹扎斯绞刑。

虽然军事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对如何审判决斗相关人员意见不一，但总检察院认为，丹特士召普希金决斗，并给他造成致命伤，应该接受惩罚。尽管普希金给盖克恩写了一封带有侮辱性言辞的信，但那是被丹特士破坏其家庭安宁的行为激怒的。丹特士自己也承认，他曾送书、戏票给娜塔丽娅，并附有便条，这种行为是不值得尊重的。

总检察院判定，丹特士因挑起决斗和谋杀，剥夺其官职和贵族称号，降为列兵，到军中服役；丹扎斯的罪过在于非法地同意接受决斗，未加制止，总检察院念他勤恳服役多年，道德良好，免于惩罚，软禁两月后恢复原职。普希金自身的犯罪行为应与丹特士一样受到惩罚，但因其死亡，就免于惩罚。沙皇在普希金的案件中作出如下批示：“准此（总检察院所作结论），但赫克恩（丹特士）并非俄罗斯臣民，应扣留其军官证，由宪兵将其驱逐出境。”

沙皇曾下令处死普希金

最近，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PTBNA)发现一批档案，在这批170年来没人碰过的档案材料中，正有涉及普希金决斗案件的决议等材料。俄罗斯《消息报》记者曾就新发现的档案问题，采访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波诺马廖夫和娜塔莉亚·沙巴诺娃。据称，档案馆保存了军部军事司法总局巨册档案和总检察院给沙皇的报告。几十年里已经积存好几百卷，是按年份排列，但没有按字母、姓名索引排列。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者和档案专家很少利用，而这卷档案根本没到过任何人手中。现在，因为要做一个普希金作品汇编的项目，就决定翻阅几卷档案，以备万一。就这样，档案被我们幸运地发现了。

按照法律条文，他们理应被处死；尽管并无这样的先例：把决斗者绞死。在俄国，枪战是经常的，但是，决斗的事实远非都能证实。参加决斗的人可以把自己受伤的原因说成是意外导致——比如说，是在打猎时受伤的，而死亡却掩盖不了。但是，人们对禁止的事情并不谴责。在那个时代，荣誉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报告是给沙皇的。没有涂改，其中包含了事件的所有细节，附在报告的开头。很可能，尼古拉一世了解的情况不限于此：他知道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宫廷看到很多事情，做了很多事情，也对很多事情做出估计。难怪整个案件的调查审理只花了六个星期，而通常要好几个月或花一年。当时，社会各界人心惶惶，莱蒙托夫的著名诗作《诗人之死》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当诗人普希金还活着的时候，沙皇就命令“军事法庭要一视同仁地审理”涉案的丹特士和普希金了！（摘编自：新华网）